

冷战期间的古巴与中东关系

李秀珍

内容提要 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成功，卡斯特罗建立政权。这一政权对外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反独裁斗争”。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发展与中东的关系成为卡斯特罗的外交考量之一。古巴对中东的政策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在第三世界建立古巴的利益范围、增强对苏联的影响力的考虑。古巴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大致分为5个阶段。古巴对中东外交的特征，一是处理阿以冲突和中东问题的双重性；二是对于增加贸易量和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兴趣浓厚；三是在中东的行动处于高风险和多重限制之中。

关键词 古巴 中东 苏联 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 李秀珍，世界史博士、现在陕西师范大学做博士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49）。

1959年革命结束了亲美国的巴蒂斯塔政权，自此，古巴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61年4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¹。这一革命政权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宣布“保卫古巴革命，维护其独立、主权和尊严；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各国人民的反帝、反独裁斗争”^④。在这一内政、外交原则的指导下，古巴在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对国外革命运动和革命政府的支援也成为古巴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政策背景下，进入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中东、发展与中东的关系成为卡斯特罗的外交考量之一。

古巴对中东政策的宗旨和目标

在古巴的外交日程上，中东并不处于优先位置。古巴在地理、文化和种族方面更接近于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两个地区则吸引了古巴大部分的注意力。然而，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还是促使古巴政权对中东采取了一个更为积

极的立场。这些因素中有些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比如卡斯特罗主义本身的性质，宣称支持世界上任何地方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力量”。当时的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1990年5月22日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宣布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因此成为在中东得到古巴最多援助和关注的国家，其次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古巴认为巴勒斯坦是一个被殖民的民族，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巴解组织就是一支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抵抗力量。但古巴在中东还有其他方面更为实际的考虑：借助古巴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楷模形象扩大古巴革命的声望，在第三世界建立古巴的利益范围；增强对苏联的影响力。

社会主义古巴所取得的成就使卡斯特罗在第三世界声誉鹊起，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视古巴道路为一个可以选择的发展战略。古巴领导层也极力强化古巴作为榜样的看法。一些诸如此类的因素使古巴赢得了许多国家和团体的景仰。古巴也希

¹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页。

^④ 毛相麟著：《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46页。

望借此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

古巴与苏联关系是促使古巴卷入中东的又一重要因素。苏联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第十天就承认了古巴政府，并陆续向古巴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帮助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站稳了脚跟。此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关系全面展开，古巴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高度优先和特别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苏联从多方面对古巴的中东政策予以鼓励，从支持古巴在两伊战争中的调解角色，到向古巴在阿拉伯国家建立军事机构提供必需的军事援助。苏联通过这种间接方式扩大了古巴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作为回报，古巴也特别注意与苏联对中东政策的协调。1973年以来，古巴对中东政策就在许多方面与苏联保持一致，具体表现在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努力；支持巴解组织和建立巴勒斯坦家园；建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地区阵线；与激进的和保守的阿拉伯国家都建立外交关系；与当地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保持联系，并予以支持；鼓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与苏联在中东外交立场的协调一致虽然为古巴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它也付出了代价。阿拉伯国家如埃及、利比亚等怀疑古巴的不结盟，认为古巴是苏联的傀儡。古巴与苏联的密切关系使古巴在中东的行动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反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猜疑。结果，古巴调解者的角色处于危险之中，只得在配合苏联的中东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支持古巴友邦、在阿拉伯内部冲突中保持中立几方面寻求平衡。

古巴对中东的外交政策不同于古巴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策，而是支持冲突双方（尤其是阿拉伯内部的冲突），古巴人称之为中立主义，由此决定了古巴在中东寻求一种调解者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古巴就开始致力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间的团结，七八十年代投入了更多精力。古巴在敌对双方之间谨慎地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古巴对中东的政策围绕下列方面展开：阿以冲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和建国要求；两伊战争；黎巴嫩危机和战争；石油输出国组织（亦称“欧佩克”）和石油；支持信奉“反对帝国主义”的组织力量，无论它们是政府、游击

队，还是共产党；与中东的保守国家和激进国家都保持外交关系。

中东接受了古巴大部分道义援助和物质援助的国家与组织有南也门、巴解组织、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其他少数组织，如黎巴嫩共产党、阿曼人民解放阵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古巴为了扩大在中东的影响，把友谊又扩大到伊朗、科威特、约旦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古巴甚至和萨达特时代之后的埃及建立了温和的邦交关系。

古巴对中东政策的演变

古巴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大致分为5个阶段：

（一）自主双重外交阶段（1959~1973年）

1959年后，古巴卷入中东问题的程度不断加深。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涉入中东，但直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卡斯特罗革命政权都没有对阿以冲突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古巴对中东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原因有三：（1）在革命之初的几年里，古巴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需要集中力量确保本国新生政权的生存。（2）与拉美的邻国结友对古巴更为重要。（3）中东毕竟远离加勒比海，那时几乎没有向古巴提供过什么援助，在种族和文化上与古巴也无多少联系。但是，一旦卡斯特罗政权稳固下来，古巴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自然也就越来越被中东所吸引。

古巴对中东的政策遵循反帝、反侵略的基本原则。据此，古巴既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也认为与以色列的关系是正当的（因为古巴视美国为以色列暴力对抗阿拉伯人的幕后元凶）。古巴革命前的巴蒂斯塔政府与以色列关系友好，在联合国一直持亲近以色列的立场。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后，卡斯特罗政府继续推行这一政策。¹因此，古巴媒体在报道以色列时大都持同情态度，两国间还启动了数个技术合作项目。1960年后，古巴对以色列的政策稍作调整，外交辞令上反对以色列，同时在一些国际声明中口头支持阿拉伯事业。

¹ See Carmelo Mesa-Lago ed., *Cuba in the World*,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1982, pp. 153-166.

尽管如此，古巴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还是在多种场合不管不结盟运动其他成员的抨击，捍卫古以外交关系。1966年，在首都哈瓦那举行三大洲会议（the Tricontinental Conference）。与会国家呼吁各成员国中断与以色列的关系，从政治、文化和经济上联合抵制以色列。然而卡斯特罗表示：古巴在这个痛苦问题上的立场是原则性的、不妥协的、坚定的。我们不喜欢遮羞布。以色列是什么？只是教唆犯、其保护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你们为什么不中断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不过这次会议也使古巴充分认识到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性。一年后，古巴政府对1967年的中东战争表明了立场，呼吁以军撤离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但这份声明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同时，还表示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权。1969年，英国学者K. S. 卡罗尔拜访卡斯特罗之后，他在所写的报告中指出，卡斯特罗把中东的冲突归咎于美国，他既反对以色列的侵略政策，也批评巴解组织誓死歼灭整个犹太民族的做法。^①卡斯特罗的立场典型地反映了古巴这一时期相互矛盾的双重政策，他希望同时在与以色列的关系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之间维持平衡。

随着与苏联关系的日益密切，古巴在外交政策与行动上日趋注意与苏联保持协调一致，以寻求在中东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古巴开始越来越多地批评以色列的行动，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表示同情。此趋势1973年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中断与以色列的关系。1973年中东战争后，古巴第一次要求以色列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以色列成为古巴反帝的主要靶子。

在保持与以色列关系的同时，古巴革命政权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也联系密切。最早建立联系的是阿尔及利亚。早在1960年古巴还在为独立而战时，就向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提供游击队训练和医疗服务。1963年，在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进行边界战期间，古巴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两艘船的武器。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巴积极支持阿拉伯激进力量的行为越来越明显。阿拉伯代表团访问古巴，受到热烈欢迎，并发表联合声

明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家园。古巴官方媒体的社论也站在巴勒斯坦人一方，反对以色列。卡斯特罗视巴解组织为一支进步的阿拉伯力量，赋予巴解组织革命的合法性。然而，这一支持往往口头多于实际。约拉姆·沙皮拉指出，20世纪60年代古巴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极为不足，后来才不断增加。他还指出，古巴人帮助训练巴勒斯坦游击队，卷入到当地的战斗之中。^②1973年与以色列断交后，古巴于1974年赋予巴解完全外交地位。同年，巴解在西半球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大使馆级别的代表机构（哈瓦那）。

（二）配合苏联对中东政策（1973~1977年）

1973年，不结盟运动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会议，卡斯特罗宣布中断与以色列的关系，古巴与中东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古巴这样做，一是来自苏联及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二是进一步意识到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尤其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于古巴的重要性。在阿尔及尔，卡斯特罗受到来自卡扎菲的攻击，卡扎菲认为古巴不应出席不结盟峰会，因为它是苏联的盟国，不是真正的不结盟国家。卡斯特罗驳斥了这些指责，坚称苏联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因为苏联既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出于与阿拉伯世界友好关系及广泛参与不结盟运动的考虑，卡斯特罗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关系。

这一时期古巴在中东的行动不断扩展，与叙利亚的关系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1965年8月古巴与叙利亚建交。对于古巴人来说，反帝把他们与叙利亚人捆绑在一起。古叙友谊建立在古巴支持“叙利亚抗击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动派，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争取自决权斗争”的基础上。^③军事合作在古叙关系中是一个重要方面。叙利亚是古巴军队参与实际冲突的唯一中东国家。在1973年中东战争中，古巴不仅提供了后勤支持，还有大约500~700辆坦克军队参与前线行动。^④除在军事方面外，古巴还与中东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展开合作。20世纪70

^① See K. S. Karol *Guerrillas in Power*,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1, p. 400.

^② See Carmelo Mesa-Lago ed., op. cit., pp. 156-157.

^③ See *FBIS Latin America*, 14 January 1980.

^④ See Carmelo Mesa-Lago ed., op. cit., p. 46.

年代初，古巴医疗专家和医疗队开始抵达叙利亚。之后，又签署了数项经济、技术、文化、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协定。根据合作协定，古巴提供项目人员，叙利亚为古巴人提供的服务付费。古巴合作还进入了政党关系和议会关系领域。政党和议会交流的目标是协调古巴—叙利亚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讨论中东和拉美的局势。¹

越来越深地卷入基本没有改变古巴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古巴继续要求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撤退，建立巴勒斯坦家园，同时致力于阿拉伯人的团结。在1975年举行的不结盟运动会议上，古巴外交部长劳尔·罗（Raul Roa）请求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面对中东正在发生的危险事件，要有一个清楚而坚定的立场，否则就太晚了”^④。他呼吁不结盟运动要求以色列无条件从1967年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确保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在演讲中，劳尔·罗批评美国解决危机的渐进方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只会有利于跨国石油公司和以色列。最后，劳尔·罗赞扬“欧佩克在使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反抗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胜利。”^④

古巴对欧佩克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古巴认为欧佩克代表了第三世界在与发达国家斗争中的胜利，对不发达国家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古巴谴责欧佩克提高石油价格使穷国背上了沉重负担。卡斯特罗指出，提高油价对第三世界的影响远远大于工业化国家。^④

古巴在阿拉伯世界扮演着苏联利益捍卫者的角色。为了减少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担心，古巴宣布苏联不是阿拉伯世界的威胁，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和犹太复国主义。古巴反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尤其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反对美国倡导的和平谈判；支持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人。古巴人把自己和苏联视为阿拉伯人民的天然盟友，支持阿拉伯民众的反美主义。而且，在古巴看来，任何阿拉伯国家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中都必须考虑巴勒斯坦问题，因为美国把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了。相反，古巴和苏联要把建立巴勒斯坦国作为它们解决阿以冲突建议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积极行动与角色扩张阶段（1977～1980年）

此阶段始于1977年3月。此时，卡斯特罗

游历非洲，试图调解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纠葛。在此期间，卡斯特罗应邀在利比亚访问了十天。此举标志着卡扎菲与卡斯特罗在不结盟运动内部多年摩擦的和解。利比亚的友好姿态加强了卡斯特罗在阿拉伯世界的合法性，为他在中东获得更多的主动权打开了大门。

1978年在美国撮合下以色列与埃及谈判，签订了《戴维营协议》。苏联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予以谴责，古巴也加入其中。古巴反对的原因在于，这是美国试图通过让以埃单独解决问题，进而分裂阿拉伯世界。古巴认可阿拉伯人的立场，即：埃及是阿拉伯团结的背叛者。从那时起，古巴在其阿拉伯事业之敌的名单上增加了“反动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概念。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古巴频繁地把“反动的阿拉伯国家”的标签贴到埃及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尽管有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古巴对中东的政策还是显示出灵活与实用主义的一面。如对于那些并不信奉马列主义的组织和国家，古巴也乐于交往，而不完全拘泥于意识形态。这些组织和国家与马列主义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激烈的反美主义。这方面的典型之例是卡斯特罗对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看法及支持。

1975年古巴与伊朗建交，但双边关系1976年4月7日就中断了，因为伊朗不能接受古巴既承认巴列维政府、又支持伊朗反政府组织的双轨外交。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古巴很快就承认了霍梅尼政权，并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正在伊朗发生的真正的人民斗争，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力量。卡斯特罗“号召古巴人民支持和表达他们与伊朗人民的斗争团结一致。”^⑤在1979年《时代》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卡斯特罗评论说，伊朗革命得益于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这可能

¹ See *Syrie et Monde Arabe*, Vol 28, No 343, August 1982, p. 78.

^④ Raul Roa, *Proyeccion Internacional de La Revolucion Cubana*, La Habana: Editorial de Ciencias, 1975, pp. 403–432.

^④ *Ibid.*, p. 430.

^⑤ See Zelnys M., Dominguez Cortina and Luis Mesa Delmorte, “Las fuerzas de Despliegue Rapido y la Region del Golfo Arabo Persico”, *Enfoque*, 1985, No 7, pp. 1–70.

^⑤ *FBIS Latin America*, May 16, 1980.

是由于“它强烈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特征”¹。古巴这种看起来充满弹性和实用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卡斯特罗主义是古巴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卡斯特罗主义强调意识形态、反美主义和通过暴力革命进行社会变革。

(四) 暂时遭到挫败, 强调调解及社会经济合作阶段 (1981~1987年)

20世纪80年代初古巴对中东的政策暂时遭到挫败, 主要原因有四: (1) 卡斯特罗赞同苏联入侵阿富汗; (2) 古巴失去不结盟运动主席国的地位; (3) 古巴调解两伊冲突的行动失败; (4) 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古苏两国国内的问题也妨碍了古巴进一步深入地卷入中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古巴对中东的外交恢复了活力。1985年和1986年, 所有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都访问古巴, 与古巴签署了合作协议。古巴则积极斡旋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不同派别之间, 寻求它们之间的团结。然而, 古巴在团结阿拉伯各派别上无能为力, 1986年1月南也门因宗派斗争爆发内战。南也门事件再次警示古巴卷入中东的风险。之后, 古巴推行了一项双轨政策。第一条轨道是把巴解组织的不同派别带到一起, 尤其是调解强硬派别巴勒斯坦解放阵线的乔治·哈巴什与巴解组织内的多数温和派法塔赫的亚瑟尔·阿拉法特之间的冲突。两个派别在哈瓦那进行了长时间接触。1987年上半年, 巴解组织各派别努力形成一个共同立场, 以便能够使它们参加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哈巴什和阿拉法特都派了代表与卡斯特罗会晤。古巴政策的第二条轨道是对伊斯兰冲突(两伊战争、阿拉伯国家内部冲突和团体内部冲突)的各方保持等距离。

通过培育阿拉伯各组织和国家间的团结与自身保持中立, 古巴抬升了自己作为阿拉伯内部冲突调解者的地位。这是因为, 古巴既降低了自己阿拉伯国家之间丧失影响力的风险, 又增加了古巴在中东地区潜在的影响力。这种做法也为苏联带来好处。1986年和1987年, 古巴对中东的政策与对苏联的政策紧密协调。两国政策的密切配合通过共同呼吁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就可看出。简言之, 古巴扩大了其在中东的外交影响力, 同时努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社会联系。

古巴与南也门在教育、经济、科学、信息和

文化等许多领域签署了合作协定, 其中仅经济合作就覆盖了农业、建筑、轻工业、钢铁、运输、旅游和渔业等部门。^④ 古巴的技术人员还援助南也门进行近海石油勘探。此外, 古巴还向伊拉克的建筑和医疗等领域提供各种相关服务。1979年, 古巴与伊拉克签署了价值5300万美元的住房建筑合同。古巴建筑工人还为伊拉克修建了150公里的高速公路。1984年3月, 一个古巴医疗代表团抵达伊拉克, 访问的目的是扩大双边医疗合作。^⑤ 1984~1985年, 古巴医疗队为伊拉克治疗了100多万患者, 实施了1734例手术, 接生了3700个婴儿。^⑥ 古巴医疗队在伊拉克的工作和古巴的医疗服务体系引起了伊拉克官员的兴趣。古巴还与伊拉克在计算机科学、运输和教育领域进行合作。1984年, 哈瓦那大学和巴格达的摩苏尔大学签署了交流协议。1980年6月, 伊拉克青年和体育部长访问古巴, 两国政府签署了体育和娱乐合作协定。^⑦

古巴对中东外交的特征及评价

1959年以来, 古巴与中东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多, 且方式多样。古巴对中东的政策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杂糅, 风险和限制同在。

(一) 卡斯特罗在处理中东问题上有双重性

一方面, 古巴越来越多地批评以色列(虽然外交关系持续到1973年), 坚决反对那些亲美国的中东国家。另一方面, 在那些革命团体、国家和派别的内部冲突中, 古巴选择保持中立。古巴关于革命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宽泛和灵活的, 涵盖了各种政权, 如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南也门和巴解的主要派别。虽然呼吁阿拉伯兄弟间的团结, 但古巴的政策是中立。古巴不在相互斗争的激进力量中选择支持哪一方, 而是扮演调解者的角色, 支持所有反美、反帝力

¹ “An Interview with Fidel Castro”, *Time*, February 4 1980, p. 48.

^④ See *FBIS Latin America*, June 20, 1980.

^⑤ See *FBIS Latin America*, March 23, 1984.

^⑥ *Granma*, Vol 21, No 279, November 26, 1985, p. 7.

^⑦ See *FBIS Latin America*, June 20, 1980.

量。古巴的双重政策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考虑的结果：一是反美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二是关注苏联的目标和利益；三是古巴利益的最大化。对古巴而言，调解者的角色既让古巴保持了与友邦的关系，又为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奠定了基础，还减少了必须站在一个阵营或另一个阵营、选择了错误或失败一方的风险和代价。对于苏联而言，古巴的调解也为苏联扩大影响打开了机会之门。苏联在幕后不直接卷入地区纠纷，表面看来也少了对阿拉伯人的威胁，同时对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甚至对以色列敞开了大门。

调停需要灵活，有弹性。古巴努力表现出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以便成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调解者。这一策略使古巴在两伊、巴解各派别、南也门争斗的各方、巴解和叙利亚、南也门和苏联、不结盟运动内的阿拉伯各组织和国家间斡旋。然而，实用主义和灵活不能超过古巴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卡斯特罗主义的原则。

（二）经济目标的重要性在古巴的国际事务日程上居第二位

尽管如此，古巴对于增加贸易量和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兴趣浓厚。在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时，古巴也考虑到贸易因素。

有关古巴与中东贸易的数据缺乏，大致来看，1959年后古巴和中东的贸易量不断增加，但20世纪70年代后进出口流量出现了大幅波动。1970~1980年，古巴在中东地区的作用扩大，几乎同一时间古巴与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总体上明显增加。但到1981~1982年，增长的趋势停滞下来，之后直至80年代中期贸易量剧减。除了对南也门和伊朗的出口，古巴对中东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急剧减少。原因是80年代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古巴经济和全球经济，此外，即是古巴出口商品的低价。古巴在中东主要的贸易伙伴，按照重要程度排序依次是：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叙利亚。除了埃及，其他国家都是与古巴政府关系密切的政治盟友。与古巴关系并不密切的两个国家沙特和黎巴嫩，也是古巴重要的贸易伙伴。沙特和古巴虽然相互无外交关系，两国的非官方关系同样很紧张。然而，双边贸易

在继续，这显示了双方的实用主义和政经分离。

（三）古巴在中东的行动处于高风险和多重限制之中

一种风险来自古巴所支持的许多政权国内政治的脆弱性。高层之间充满政治争斗是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宗派主义危害到巴解、南也门、甚至利比亚的团结。分裂导致了黎巴嫩内战。叙利亚、科威特和伊拉克政府政治基础狭窄，这使它们面对领导层内部冲突和民众压力时显得尤其脆弱。中东地区的复杂情况不仅危及古巴在中东的外交目标，也加大了古巴卷入中东的成本。国家间的敌对关系，如两伊之间、南北也门之间，给外来者造成极大困难，令它们难以在两方之间做出抉择，难以选择中立。古巴在外交上必须小心谨慎，既要避免陷入尴尬局面，又要避免站在冲突失利的一方。

另一种风险来自超级大国卷入中东。美苏的行动和利益给古巴带来了危险因素。第一，古巴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会遭遇来自美国或以色列抵制的风险。第二，虽然苏联与中东激进国家的关系成为古巴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榜样，但它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限制。例如，阿拉伯人对苏联的不信任可能也会转化为对古巴人的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阿拉伯领导人视古巴为苏联的代理人，担心它的行动，怀疑它的动机。古苏联盟还带来了其他限制，主要是它们共同意识形态。阿拉伯国家在国内镇压、甚至大批屠杀共产党人。苏联的干涉只能加剧这种局面。这表明了一个事实，虽然中东国家希望得到苏联的武器、物资和其他支持，但不愿苏联干涉中东国家内部事务或国内政治。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个因素成为苏联、古巴扩张其影响不可逾越的障碍。

尽管如此，古巴对中东的政策还是广泛的和有影响力的。古巴与中东许多国家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对于一个远离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落后小国而言，古巴取得的成绩令人称奇。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安春英）